

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样板

——评范·弗拉森哲学思想的演变

□ 郭贵春 胡瑞娜

〔内容提要〕本文从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视角，揭示了范·弗拉森哲学思想演变的特征，阐明了范·弗拉森作为一名反实在论者，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狂飙及与科学实在论的论争中，其哲学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所经历的巨大转向。从而说明系统地分析范·弗拉森哲学思想的演变对于把握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特征，并站在反实在论的立场上看待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Von Fraassen's anti-realism, It tracks down the development of Fraassen'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which has exerted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post-modern antirealist trend.

自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学转向”为先导的一系列哲学“转向”以及“后现代”运动的激流,冲击了所有哲学的城堡,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哲学派别无论是批判、反对、顺应或修正这一潮流,均从自身的利益和前途作出了敏锐的反应,以为自己的哲学立场重新定位,选择新的发展趋向。处于这一时代风口浪尖上的范·弗拉森,其反实在论的哲学思想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其演变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构建反实在论的后现代经验基础、后现代方法论以及后现代真理概念。正是这些特征,体现了范·弗拉森后现代反实在论哲学思想所独具的风格、意义和历史印迹。

一、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特征

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领域中,范·弗拉森作为一名杰出的反实在论者,以“双向批判”的手法,既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又是反实在论阵营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正是通过这种批判,他实现了自己朝向后现代性的转变,创造性地构建了以反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为目的,以经验适当性为本质特征的反实在论的构建经验主义,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上,去重挽经验主义的命运。其后现代反实在论由于自己的利益所在以及背景差异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自己的风格和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接纳实用主义、修正经验主义的纯粹性。历史地讲,古典实用主义在隐退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由于其所固有的反传统特点适应了“后现代主义”精神这种新的时代氛围,于是重新登上了美国的历史舞台。作为一名美国哲学家,范·弗拉森必然要受影响于这种大的哲学背景。所以,他从美国实用主义那里汲取了某些养料,以适应哲学未来发展趋势,试图构造一种哲学语境,为科学哲学实现后现代“转向”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这就在于,他认为接受一个理论除了涉及认识态度之外,还会涉及实用的方面。因为我们从来不会遇到一个无所不包、每个细节都完善的理论。即使是两个经验上等价的理论,接受其中一个而放弃另一个也会有很大区别,而这种区别必然是按照经验适

当性原则作出的,这其中就蕴涵了丰富的实用内容。因此,当我们接受一个经验上最小的理论时,并不是由于这个理论优于其它理论,而只是从实用角度选择的。尤其是,尽管形而上学包袱是无用的,而且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收获,但是,我们也可能对它产生兴趣,那就是因为它对未来存在着某种实用的意义。当然,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实用的特点并不会超越经验材料使我们相信理论为真,它仅仅是在经验范围内而起作用的。显然范·弗拉森把实用主义的某些特点赋予了经验并形成了经验适当性的本质特征,试图克服经验主义纯粹认识论态度的弊端,适应了后现代哲学反传统和大融合的趋势。

2、超越并拯救现象,确立理论与现象之间的经验关联。自柏拉图以来,传统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探讨现象与理论或实在的关系问题,但却始终没能得到解决。范·弗拉森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哲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论题,从而重新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将理论与现象分离的片面和传统实在论将二者等同起来的机械性的过程中,力图在经验基底上,以其适当性来“拯救现象”,奠定了理论与世界的一种新型关系。他告诫人们,经验适当性涉及到了实际现象,即发生或未发生什么,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下会发生什么等等。换句话说,“经验的适当性总是超越在任何给定时间人们所认识到的东西。”^①因此,当我们断定一个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同时也就是断定了我们相信理论关于这个世界中的可观察物和世界的描述是正确的,也就是理论拯救了现象。但是,这里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界限问题。范·弗拉森认为,要发现理论所描述的世界可观察部分的界限,我们就必须探究理论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超越现象来探究现象,从而获得理论的经验蕴涵。正是这些超越了现象相似性的更本质的经验,才能输入理论的内在意义,才能使现象摆脱与经验的本质分离以及经验自身的断裂,从而实现由经验适当性去拯救现象的目的。在这里,没有超越,就没有拯救,也就无法确立理论与现象之间的经验关联以形成构造经验的内在本质。

3、引入整体论观念,确立经验的整个结构性。范·弗拉森为了反叛和修正传统哲学所过分强调的“普遍论”这一现代性,首先引入了作为后现代思维核心

的整体论,从而力图把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和相关性结合起来,去说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动方式。在他看来,经验适当性是一个理论的整体特性,所以一个理论的经验意义不能在句法上被割裂。因而,人们必须在没有任何经验迂回的情况下定义经验的适当性,即所有的观察现象都适合于一个特定理论模型的经验的结构。如果一个理论不能适合所有观察现象,那么就必须对它进行修正和扩充。但这同时也内含了原理论的失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体理论的描述“大于”在观察基础上所决定的附属的特定部分,同时科学的假设必然也要超越经验证据,使它获得整体的理论意义。可见,经验是一个整体结构,它具有语义的整体性;经验适当性功能正在于它调整了理论的整体意义系统与可观察部分的特性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本质上,经验适当性是一种科学理论与测量现象之间的认识论的整体关联,离开了这种关联,也就失去了经验的适当性。

4、消解绝对性,突出经验适当性的相对性。传统哲学所共有的特征是试图寻找一种确定性,渴望得到一种普遍的、绝对的、可靠的知识基础。为了批判传统哲学的绝对主义,范·弗拉森把相对性突出于经验适当性中,从而以一种“弱”的立场避免甚至消解认识论中真理的确定性,换句话说,“断定经验适当性比断定真理弱得多,而且接受理论的这种束缚把我们形而上学中解救出来。”^②可见,经验适当性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相对性,它以适当性代替了真理的绝对性,从而站在反实在论立场上以经验为基底在价值观上捍卫经验主义,摆脱困境,消解哲学难题。当然,这种相对主义并非一种把不确定性或相对性极端化了的“绝对主义”,而是一种体现了语义整体论的相对主义。

总之,范·弗拉森沿着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趋向,接纳实用主义,引入整体论和相对性观念,超越现象并拯救现象,使理论与现象之间的结构相嵌性成为一种真正的、有创造性的经验的建构,从而最终在适当的经验基底上构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后现代反实在论。

二、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方法论

本世纪以来,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实现和解释学

转向的深入,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在某种意义上转向了“朝向语言生长的”、以语言观为基础的多种方法论形态。范·弗拉森的构造经验论的建构便是与其语言观的确立和转变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他的构造经验论是以语言观为基础的理论系统,它将人类科学活动的本质归结为用语言来构造科学解释的模型而非发现;另一方面,为了反对“语言学转向”所推崇的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和形成理性的绝对权威,又必然要实现语言观的变革,以建构其后现代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由分离的语言观转向统一的语言观正是范·弗拉森后现代方法论思想演变的核心。

1、消解分离的语言观。句法分析是在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所引起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广泛运动中突现出来的科学解释方法。它与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范·弗拉森曾不无赞赏地指出:“现代符号逻辑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仅仅根据处理符号的规则给这些逻辑功能和关系以精确的句法定义。”^③逻辑经验主义者主要是在区分观察术语和理论术语方面运用句法分析并把它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但这必然会产生一个更加哲学化的问题,即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科学术语都或多或少与观察测量直接相关。这样的话,观察术语与理论术语的区分就显得站不住脚了。为了求解这一难题,那些仍然强调句法分析的人们转而开始把语词区分为真理术语与经验适当性术语。而范·弗拉森便是其中之一,他试图用句法学方法来解释经验适当性和等价性。但是他很快便发现用句法学方法定义的经验适当性太宽泛了,且易于导致理论的同语反复。于是,他转而效法奎因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术语与观察术语二分法,并由此清晰地意识到一个理论的经验意义不能在句法形式中被割裂;同时用句法学定义的关系是易错的,因为那种单纯的形式句法分析只会把真理与经验适当性之间的区别导向极其“琐碎的、甚至荒唐”的地步。而且,试图通过区分语词而在现象和超现象之间作出概念上的区分以解释经验的适当性和等价性是注定要失败的。正是这个意义上,范·弗拉森不无感慨地指出:“20世纪科学哲学最主要的教训可能就在于,在本质上依赖于语言的任何概念都完全不具有哲学价值。”^④因此,为了适应继“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解释学转向”对语义分析方法全面展开和系统的运用,从而强化自身理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他

抛弃了逻辑经验主义对句法分析的倚重而转向了对语义分析的青睐。范·弗拉森强调语义分析途径的一个最直接的动机就是要消除过量的“语言哲学”，同时排除单纯的公理化形式分析。他指出，萨普创造性的格言“数学，不是科学哲学的元数学”就标示了这种动机。而且，在他看来，语义分析方法主要是针对理论模型而不是理论术语的形式化表达，其分析是语义的而非句法的。它与其他分析方法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态度、倾向和策略上的区别而不是学说或论点的差异。尽管以纯粹句法术语来表达逻辑命题并通过迂回的方式去构造理论模型常常会展示得极为简单，但是真理和模型的概念实际上属于语义分析的范围，而不是句法学。另外，语义分析方法并不仅是“逻辑的侍女”，逻辑告诉我们的仅仅是理论模型的一致性，却不能叙述同晶性的关系；而语义分析方法却与科学理论有着某种同晶的或可相嵌的结构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对于理论评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范·弗拉森把经验适当性和“经验力”（empirical strenght）概念嵌入到真理和“逻辑力”（logical strenght）概念当中，构成了物理理论语义分析的基本概念，从而拓展了语义学的深度和广度。在这里，范·弗拉森的分析不仅涉及到了不同层次的理论模型之间的差异性，而且涉及到了自然语言的关联和对模态的阐释，从而承认了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克服了句法学仅仅强调语词之间、符号之间关联的局限性。

但是，如果仅仅把理论解释局限于句法学、语义学层面，则会导致一种僵化而又不可通达的科学说明。范·弗拉森在继续构造、评价、阐释其理论的过程中深刻地洞察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继“解释学转向”之后，后现代“语境”概念逐渐突现出来。这促成了范·弗拉森力图要构建一种以语境为基底，以句法、语义和语用相结合的解方法论，从而使哲学从独白走向对话，克服由于语义分析而导致的自然语言的缺失，寻求一种在经验上更为适当的科学解释方法，实现他自己由“分离”的语言观向“统一”的语言观的后现代转变。

2、构建统一的语言观。范·弗拉森所建构的以“后现代”语境概念为基底、以句法、语义和语用方法相结合的语言观是在他对以前那种支离破碎的语言观批判的基础上，随着“语境”概念和整体论观念的引

人，通过消解语言哲学中的困境而形成的。

首先，后现代“语境”概念突破了传统静态地指示相关语词关系的狭隘层面，突出强调了主体意向在语境中的不可或缺地位，以及解释实践与语境的统一性，强调一种“有理由”的劝说而非仅仅有理性的论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语境”概念成为自然而然的观念，同时也决定了把它作为范·弗拉森新语言观的基底而显现出自身的魅力。

其次，后现代整体论观念的广泛渗透，使范·弗拉森在屡次变换其科学解释方法过程中，领悟到单纯使用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完善的，语用分析中离不开句法分析，更离不开语义分析，这三者是点线面之间的关系，它们相辅相成，彼此作用。他把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使用结合起来，以“语境”为基底，构成了他新的科学解释方法。

最后，范·弗拉森之所以能构建其后现代科学方法论，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他要消除科学解释方法的困境。他首先批判了以往科学解释观中的三种错误观点：（1）认为解释是理论或假说、现象或事实之间的简单关联，就象真理一样。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将理论、事实和语境三方面的动态关联仅仅看作是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类似描述的关联，忽视了对语境的语用分析；（2）认为解释力不能在逻辑上以一个理论的特定优点特别是其相关真理性或可接受性相分离。这就将一个理论的可接受性与其解释力等同起来。事实上，尽管解释力是理论选择的一个趋向，但一个理论的可接受性与其解释力并不等价；（3）认为解释即是科学探索的结局。这种见解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忽视了解释的成功即是适当的信息描述的成功，科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其自身的经验上是适当的和在经验意义上是“强”理论性的。比如，“隐变量”在物理学的实际研究中，当它在测量的经验预测中毫无作用时，是要作为形而上学的包袱被拒斥的。正是基于这些科学解释观批判性的审视，范·弗拉森指出：“科学解释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科学的应用。它是满足我们特定愿望的一种科学使用；这种愿望在特定相互关联中不尽相同，但它们总是描述信息的愿望。”^⑤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范·弗拉森吸收了形式语用学特别是疑问逻辑的研究成果，以语境为基底，结合句法和语义学，为他消除传统科学解释的难题找到了解决途径。

3、确立语用论的科学解释模型。历史地讲,无论是与亨佩尔、奥本海姆相联系的统计分析解释观,还是与贝克纳、普特南和萨尔蒙相关的统计相关理论,都拓展了科学说明的论域和深度,将科学解释的认识论探求由普遍规则和说明转向了对特殊事实或个案的说明,从而以“弱化”的形式达到了“弱化”的目的。但是,在“解释的拒绝”(Rejections)和“解释的不对称”(Asymmetries)这两大难题上,“统计分析”理论没有提供充分的价值,而“统计相关”解释也最终作为一种自主形式被放弃。面对这一系列难题,范·弗拉森提出了他独特的解决方式。

首先,范·弗拉森认为传统解释模型之所以面临困境,关键在于它们将科学解释局限于理论的语义学特性,并束缚于理论与事实的双边关系中,而事实上,科学解释应是理论、事实和语境三者之间的多边关系。所以,范·弗拉森从语用分析出发,引入后现代“语境”概念,恰当分析“反事实”条件句,发挥句法与语义分析的特定长处,从而把解释放在特定语境中,运用那些已被人们所接受的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回答涉及特定相关事实的难题。

其次,范·弗拉森为了解决科学解释观的难题,给出了他的“回答问题的解释模型”。他从语用角度出发,结合萨尔蒙和汉森的观点,引入统计相关因素,用语境规范那些相关事实中具有解释相关性的不对称关系,同时确定某些理论或信念,从而决定哪些因素是可能的,以及什么相对于什么而言是可能的,即用概率来解释科学。具体地讲,“回答问题的解释模型”有三方面:(1)解释模型要有需要回答的问题;(2)科学解释是对问题的回答;(3)科学解释需要在问题的回答中作出更恰当的选择,所以解释模型有一个伴生的评价系统。可见“解释模型”的核心是语境,这样,传统解释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既然问题的产生是依赖语境的,那么在某一语境中产生的问题在另一语境中也许就是无意义的或根本不可能产生,因而“解释的拒绝”就不成其问题。同样,在这种情况下,“解释的不对称”难题也随之而解。于是,范·弗拉森以他持有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对传统解释难题的消解。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范·弗拉森试图通过语

境来消解“解释”与“描述”之间的根本区别,排除传统科学解释的难题。他坚持实用主义与语言哲学相融基础上的语用学和语义学、句法学统一,使语言在语境基底上成为非中介性、工具性和隐喻性的存在,并在这种本体论性的基础上去解释科学。但是,从本质上讲,他为了试图摆脱问题与实在的客观说明之间的关联,回避了对规律性和因果性等核心的认识论问题的回答,从而经由语用分析的途径,走向彻底的具有较强后现代性的经验建构论的解释论。

三、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真理观

范·弗拉森在考察了2000多年的哲学史后发现,真理问题始终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因此,他的构造经验论的建构自然体现在其真理观的确立与转变过程中。一方面,他以构造经验论以反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为根本目的,力图以“弱化”真理概念来消解传统。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初的哲学思潮的影响,其真理论开始“朝向语言而生长”,并显示了较强的后现代特性,这表现为从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论走向经验论的语用概率真理论,进而探求语境论的具体真理论。

1、形成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论。当我们回顾20世纪真理问题的发展历程时,会发现在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着对“传统真理符合论”的背离和反叛。在范·弗拉森看来,“传统真理符合论”的实质就是保持信念和对象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建构的一种形而上学。随着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普遍深入,在某种程度上那种力图构造统一的、包含一切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动力被消解了,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传统真理符合论”的弊病。在他看来逻辑经验主义仅仅是再次陷入了早期经验论企图把所有真理都建立在感觉证据和现象论基础之上的困境。因此,范·弗拉森以摆脱传统“真理符合论”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困境为其建构后现代真理概念的首要任务。

另一方面,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前者为了使科学不失去文化自主性和权威性地位,力争捍卫真理概念,把后者看作是“做真理买卖”的贩子,在他们那里,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而科学的

目的就是给出关于世界存在的事实并相信接受一个科学理论就是相信它是真的。但是,在范·弗拉森看来,即使不给出存在的事实,科学理论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科学的目的是真理,而只是经验的适当性”。^⑥人们不能用可观察术语来解释不可观察的事物。于是,他对科学实在论的实体提出质疑,因而产生了其真理观的前提。另一方面,他把方法论中的概率论解释论融入其真理观,因此形成了他的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观,以回击科学实在论对他的误解。

范·弗拉森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观的本质在于:(1)他并不否认真理,赞成可观察世界的实体存在,承认接受一个理论也就是相信它可观察范围的陈述为真,即在经验上是适当的。(2)概率论的渗透使他由否定传统“确定性”的真理概念转向“非确定性”真理概念,使传统那种固有的“大写”真理为一种世俗、随机、可变异的“小写”真理所代替。范·弗拉森突破了以往怀疑论从根本上否认真理的疆界,以经验适当性替代了传统的对应的真理,拓宽了现存的理论框架,从而可能面对更多的现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在新的层面上获得了新的经验意义。

2.走向经验论的语用概率真理观。在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观形成之后,范·弗拉森认识到这依旧不能消除传统真理所带来的难题,即如何把主客体联系起来。而且,由于“修辞学转向”的到来,语用分析方法广泛渗透到各方面,这给他导引了一条建构新的真理观的途径。同时,他还试图容纳大陆和英美语言哲学中的最新反传统成分,以消除表征范围内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于是,这种种因素使他最终走向经验论的语用概率真理观。在他看来,在经验基底上,以语用分析方法和概率方法建构真理概念具有不可否认的优势:(1)有助于摆脱传统真理观那种追求绝对、终极性所带来的困境,促进解释对话的多样性;同时也有助于摆脱表征主义观念及现象和实在的二元区分;(2)在此基础上,有可能促进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真正地走向融合;(3)有益于强调语言的目的就在于具有不同词汇的人们在对理论的选择、接受和运用的语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信仰和价值取向,从而以语用实践作为沟通主客体的桥梁。

范·弗拉森所建构的经验论的语用概率真理观

是在他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观的基础上,抛弃了怀疑论前提,吸取了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对语用的强调,在经验基底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真理观除延续前者“非确定性”之外,还强调真理是被构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因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借助隐喻的方式在语言中发明或创造出一种方式去表达那些在确定语言框架中所不可表达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消解绝对客观真理观念的同时来建构相对内在的真理观念,就具有了合理性。这种在主体对话层面上所构建的真理,不必要求当下的经验证实,而只需信念之间以及信念同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贯。

可见,范·弗拉森的语用概率真理观的本质就在于,“效用性”成为一切建构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它突出强调生活实践中经验的地位,把这种经验不是当作认识的阿基米德点,而是看作在进行实践活动的各种相互作用的东西总和。因为,当我们把对语用的理解推向语义学的外围并关注于其起作用的方式或实践意义的过程时,语言在本质上成为人们用以协调自己活动的方式。其目的不在于去用形式体系规范各类哲学陈述或阐明言词与世界的“符合”关系,而仅仅在于清晰地展示出拥有不同词汇的人在对理论的选择、接受、运用的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信仰和价值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范·弗拉森走向了语用概率真理观。

3.探求语境论的具体真理观。语用概率真理观固然促进了未来新哲学的进程,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在对话中的统一,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创造了新的聚合点。但它无疑会使人类思维陷入无根的迷途,呈现出一种类似黑格尔理念主义的自我迷恋状态。因为当人们沉溺于主体间的私人对话时则会日益困顿于自设的“语言框架”而忘记了对话的目的在于与更多对话的融洽交流。因此,范·弗拉森清晰地看到必须有一个不可还原的生成于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之上的基底。在这一基底上,一切由于语义分析而导致的自然语言缺失,由于语用对话而导致的语言私人化的困惑,即“解释的拒绝”和“解释的不对称”问题将被克服。后现代“语境”概念的广泛渗透恰恰提供了这一基底。于是,范·弗拉森开始探求语境化的具体真理观。表现在如下方面:

(1)把语境看作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讲,“在对科学理论评价的分析中,忽视影响评价的语境因素是错误的。……认为评价科学理论的术语是‘纯卫生学’的(hygienic),并且与其它评价以及所涉及的个人和环境等无关联的观点都是错误的。”^⑦可见,在这里,范·弗拉森突破了传统把真理凌驾于一切的作法,引入语境观念,强调境遇,使真理具体化于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中,同时使得他本人在这种带有很强后现代性的语境构造中、为语境寻找自己合理存在的地位,摒弃导致真理符合论的途径并使其载体脱离与外在世界的僵化关联。

(2)“语境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对于条件陈述的真值起着关键性作用。在他看来,“语境变量”决定了那种不言而喻的,其余情况均保持不变的从句的内容。因为如果其余情况均一致,并且语句、事实以及语境因素把内容固定下来,那么就不会产生任何困惑。这里,范·弗拉森把语境看作具体形式即一种变量在起作用。这种在后现代视角上把真理具体化、语境化的方法,为真理提供了一个十分“经济”的基础。一方面,语境所展示的作为人类对话要素结构的特性,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实践性和历史趋向性,使得人类思想的对象都被“语境化”了,一切均取决于当下情景状态中所进行的平等对话。另一方面,语境这种变量成为展示价值趋向的认知方式。它不仅能够成为解决科学评价中困惑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且只有在当下的,符号使用和语词指称的情景下,科学评价才具有完全现实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范·弗拉森在构建其后现代真理观的过程中,开始走向语境化的具体真理观。因为,这适应了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向,同时可以消除任何先验或超验的真理、范畴或本质。因此,不是真理具有任何独立语境的意义,而是只有在动态的语境中才能展示真理的存在。

当然,范·弗拉森并没有把语境完全绝对化。因

为他意识到语境化的具体真理观仅仅是真理发展的一种“趋向”,因此他讲:“条件真值部分地依赖于语境。科学并没有暗示语境是唯一的或另一种方法。”^⑧但无论如何,范·弗拉森所探求的后现代“语境化”的具体真理观冲破了传统真理符合论的桎梏,内在地体现了后现代性趋向的迫切要求。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⑧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69、P69、P42、P56、P156、P87-88、P118.

⑥ Bas. C. Van Fraassen, *Laws and Symm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92.

参考书目

1. Bas. C. Van Fraassen *Quantum Mechanics - An Empiricist Vie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2. Paul M. Churchland and Clifford A. Hooker, *Images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3. Bas. C. Van Fraassen, "To Save the Phenomena", In *Scientific Realism*, Ed. by Jarrett Lepl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4. Bas. C. Van Fraassen, "The Pragmatics of Explan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by Richard Boyd, Philp Gasper and T. D. Trent, MIT Press, 1991.
5.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知识出版社,1995。
6.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郭贵春,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瑞娜,山西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曾德雄